

从这里出发

■ 范咏戈

体系,不仅北方经济再也无法独立支撑起对中国的统治,而且原来的江南与中原那种依附关系也由紧密变得松散。稻作文化或曰鱼稻文化,这种方式依靠的是大自然提供的条件,不需投入太多的人力资源,凭借自然的优越,江南民族在几次面对人类食物链大破坏的情形下仍然可以保持着相对富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使在中国大的政局动荡的时期,接二连三发生大的军事杀伐,江南依然明显地保持着她的区域优势。相反,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土地贫瘠,产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在食物分配体制强制性驱使下,北方民族便逐渐发展了政治——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偏重于以社会伦理为核心,强调的是如何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体精神自由和审美潜能则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退居其次。

终于又到了被称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的西塘。

坐在柳叶般的小船上沿河而行,“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陵”,两岸朱痕犹在的雕梁画栋之间,到处嵌进了桥,望得见水。岸上店家密匝,前店后坊。前店坐着卖豆腐的老板娘,后坊却拴一头骡子,驮着头的“笃”“笃”拉动石磨磨豆浆。水镇西塘被9条河流划成8个板块。家家临水人影,户户粉墙高耸。人处其间,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廊棚下不知哪一家的野杨梅树,把靠河的房子遮了阴。老屋的主人说,秋天时果子熟透,“吧啷”“吧啷”地掉落河里,掉落在大青石的河埠上。掉落在大青石上留下股红一片,掉落在河里引来游鱼争食啄,河面上便漂起一片胭脂红。水乡的路在船上,西塘人会把橹做成琵琶的形状,琵琶橹一摇,小船便在“欸乃声声”的橹歌中,在绿水清波中起舞了。

河埠上大都刻着“鼻纽”,讲究一些的刻成兽头状,两边有孔,用来系船。船停岸后,手扶被称为“吴王靠”“西施靠”的木栏杆上得河埠,老屋的八仙桌上菜已上桌,一篮椒盐鲫鱼,一碗荷叶粉蒸肉,一盏毛豆羹,一钵馄饨老鸭煲,还未等端起盛满了“嘉善黄”的洒碗,“馋虫”早已被引出。“弃置功名意若何,一天烟雨好披蓑。江乡舂舂寻常事,赢得身闲脱网罗。”(明·蒋谊)以江南鱼稻和水利构建起来的江南诗性文化,为秀城再造了一座审美的精神家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山”也好“乐水”也罢,都是为了在亲近自然中恢复被压抑的人性。

美丽灵性的山水,最易使人从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等社会规范束缚中脱离出来,使疲惫的身心获得片刻的舒展和安息。

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认为只有选择了居善地,方能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处于杭嘉湖中心的嘉兴,虽然不如上海摩登,不似杭州有闲,但惟其如此,才能说它是江南诗性文化的核心和原版。沿河老楼门楼上“维和集福”的题额,奉法惟谨,崇文厚德,“其俗少阴狡”,绝少小市民气的民风,都说明着嘉兴人已褪尽了先人粗犷好斗的粗犷,显出了成熟与圆满。泛舟南湖,我试图从淡雾笼罩的烟雨楼找回历史的足印。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之所以把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一次秘密会议移师嘉兴南湖,是否和对嘉兴民风有足够的了解有关?佐证我这一想法的是关于南湖的另一故事。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轰”的一声巨响,使正在庆祝“天长节”的侵华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等众多高官当场毙命。事发后,投弹勇士、韩人爱国团员尹奉吉英勇就义。流亡在沪的韩国独立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等被日军悬重金追捕。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是嘉兴义士褚辅成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掩护金九等从上海乘火车到嘉兴住下。金九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居然一住就是两年多。嘉兴以她充满母爱的蒙蒙烟雨庇护了小草一样柔嫩弱小的初期中国共产党,浩淼的南湖为韩国志士放生。拭去这座城市风花雪月的历史风云,她原本是一座英雄城市、荣誉城市。

感受着同样的江南诗性文化,嘉兴和苏州的韵味也绝不一样。苏州精致而舒适,多有归隐之士。听一下苏州这些园林的名字吧:王献臣造“拙政园”,清光禄寺少卿宋宗元来苏州养老,重造“网师园”,网师者,渔夫,渔翁也;北宋诗人苏舜钦罢官后流寓苏州,修建“沧浪亭”,号称沧浪翁;被参劾落职的任兰生回到同里,建“退思园”,以示“退则思过”的心迹;沈复生在苏州写“浮生六记”;范蠡帮助越国灭吴后,从嘉兴发棹,带着西施也来了苏州归隐……

而南宋以后成为了“龙兴之地”的嘉兴似乎注定了是“出发”的。作为一方“罕习军旅,尤慕文儒”的热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祖籍嘉兴)、茅盾、王国维、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张乐

平……连接起来是一部顶尖的文化名人卷。他们都从嘉兴“出发”。在东米棚下17号的莎士比亚专家、诗人朱生豪的卧室和书房,我久久徘徊。正是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朱生豪忍受贫病交加的困苦,从1943年开始,以两年时间,译出莎氏全部悲剧、杂剧、喜剧共31部。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在肺病不治的生命最后时刻,两次在昏迷中突然双眼直视高声背诵莎剧原文,音调铿锵,绝命而去。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译31部剧本,朱译本仍以译笔流畅、文辞华赡,被公认为一流。张乐平在嘉兴的3年里,每天到嘉兴北门外中基路的猪廊下收集“小瘪三”的故事,在这里创作了不朽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茅盾写完《子夜》后用所得之稿费在乌镇造了新屋,准备在这里创作长篇小说《先驱者》。只是因为1936年10月接到鲁迅先生在沪病逝的消息,才中断了写作立即赶回上海。伟人毛泽东两次来嘉兴,都和“出发”有关。一次是1921年来嘉兴建党,不消说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出发:一次是1957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来海宁观潮,那时正是新中国最好的时期之一,诗人政治家胸中一定构思着新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病死的1916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携夫人宋庆龄来海宁观潮,心中酝酿的也一定是“出发”,不然怎会亲题“猛进如潮”四个大字呢?

作为一个北人,我曾特别在意鲁迅先生《北人与南人》中的那一段话:“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毕其一生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文化伟人鲁迅把北人南相、南人北相看作是中国人的自新之路,这可不是一般的评价。

嘉兴地处吴根越角的首善之地,得天独厚,它除有小桥流水之柔,更兼有钱江大潮之刚。这方水土哺育着刚柔相济、南人北相的嘉人。而如今富庶盖全国的秀城,已证明了嘉兴人已“做成有益的事业”。

于是,突发奇想的我想为西塘的口号“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添上这样一句:“行进着的江南文化”。横批呢,就用中山先生的“猛进如潮”吧!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傍晚下班时,天空飘起了小雨。机关两名干部接到赴边任职的命令,将要启程。送战友,踏征程。机关干部争相来到楼下送行。“敬礼——”一声令下,大家举起右手,用军人最简单而又隆重的方式,为战友送行!

送别敬礼,礼重情更浓。只要留心就能发现,如今从机关到基层,战友分别敬礼相送的方式已成了习惯。

军人这种朴实而不失庄重的送别方式,在军旅生涯中有两次令我印象甚深。前年深秋,我应邀到驻闽西某旅采风。月亮高悬,繁星闪耀。熄灯号响过许久,营区一片寂静,住在我隔壁的赵旅长依然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原来与他搭档多年的房政委转业,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部队。

旅长告诉我,要在以往根本无须纠结,转业干部离队,按惯例可在内部招待所摆酒欢送,回忆共事岁月,送上浓浓祝福。可出台禁酒令后,送行酒早已封杯。他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情感世界波澜不宁,无法安睡。

秋虫唧唧,柔风轻拂。我劝旅长,政委是个讲党性、懂情义、胸怀宽广之人,肯定能理解……

第二天起床号响起,赵旅长将旅机关的官兵召集起来,在营区的路上排成两列。他是要以军人特有的礼节,隆重为政委送行。

“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营区广播里放着这首贴合送别气氛的歌。房政委刚出门,赵旅长扯开洪亮的嗓子:全体都有,敬礼,为我们老政委送行!霎时,上到班子成员,下到连队官兵,庄重地举起了右手。如此礼节郑重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病死的1916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携夫人宋庆龄来海宁观潮,心中酝酿的也一定是“出发”,不然怎会亲题“猛进如潮”四个大字呢?

别时未闻酒香,情意同样绵长——因为这是军人送别最高最纯最真的礼遇。我伫立在送行队伍中,第二天就要回机关。晚饭前,崔指导员从训练场跑回找到我,说在营区门口的餐馆订了个包间,想代表连队支部送送我。其时尽管尚未出台禁酒令,可我知道连队没有接待经费,便婉言谢绝了。

临别未能喝酒相送,崔指导员满脸歉意,知道我是江西人,喜欢吃辣,晚上特意交代炊事班,悄悄给我加了个菜——青椒炒鸡蛋。想想战友们天天训练执勤多么辛苦,晚饭后,我端起盘子,将菜分到了战友们的碗里。

第二天早饭后,当我走出连队排房时,眼前的一幕让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全连官兵集合在门口高大挺拔的杨树下,排成两列夹道为我送行。随着崔指导员下达口令,战友们庄严地向我敬礼。

营区的营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设施陈旧,布局落后,住在山下,吃在山腰,训在山顶,战友们生活和执勤不太方便。发现问题后,我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经多次协调,军区营房部门将连队所在的营区列入当年改造计划;宣传部门给连队图书室补充了2000册新书,军需部门为连队配发了不锈钢制式餐盘……

一个雨夜,我无法入眠,特地起来去看看山上执勤的哨兵。上山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寒气逼人。哨兵膝

深情的军礼

■ 李根萍

盖以下的裤子全淋湿了,鞋子里也灌进了雨水。握着哨兵冰凉的双手,一份感动涌上我心头:在这样的雨夜,不知有多少哨兵正默默地点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着祖国的平安。在甜梦中安睡的人们是否会知道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军人在默默付出。

连队指导员崔,个头不高,举手投足稳重干练。连长刚提升,新连长暂未到位,他一肩挑两个担子,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战士们悄悄告诉我,他家连遭不幸,先是姐姐去世,继而父亲患癌症,接着自己出生三个月的儿子又患上血管瘤,几次手术均未痊愈,欠下了许多债务。可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从未向不幸屈服过,更没把自己的不幸显露在脸上,家中和连队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让我心生敬意。

眨眼间跨点结束了,第二天就要回机关。晚饭前,崔指导员从训练场跑回找到我,说在营区门口的餐馆订了个包间,想代表连队支部送送我。其时尽管尚未出台禁酒令,可我知道连队没有接待经费,便婉言谢绝了。

临别未能喝酒相送,崔指导员满脸歉意,知道我是江西人,喜欢吃辣,晚上特意交代炊事班,悄悄给我加了个菜——青椒炒鸡蛋。想想战友们天天训练执勤多么辛苦,晚饭后,我端起盘子,将菜分到了战友们的碗里。

第二天早饭后,当我走出连队排房时,眼前的一幕让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全连官兵集合在门口高大挺拔的杨树下,排成两列夹道为我送行。随着崔指导员下达口令,战友们庄严地向我敬礼。

车行好远了,连队的官兵仍站在杨树下……回首间,我两眼潮湿,心绪难平。那个军礼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成为军旅生涯中最美的风景。

军装情愫

■ 欧阳权

先穿着,以后再调换。”助理员对我说。

可没想到,妈妈见到我,开心地说:“我的儿子好威武,不大,好衬身材。”妈妈在夸我!我一时哭笑不得。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身军装,现在回想起那一幕来,还回味无穷。后来,到部队后,妈妈来信中说:“我确实把你的身高写反了。”也许是儿子当上了兵,妈妈太兴奋与激动的原由吧。

到新兵连的一个周末,连里来了一名摄影师。排长告诉我们,每人可以照一张相片寄给最亲近的人。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营房前的白杨树下,由于衣服太长,我想把它卷起来折叠一下,用胶布贴住拍一张精干的照片。排长立即喝住我:“不许折,衣服长点有啥关系?咱当兵的,只要穿上军装,个个都潇洒!”听了这话,我立刻摆出立正的姿势。随着“咔嚓”一声,第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出来了,我忐忑地把它寄给了家乡的女友。不久,女友来信,说我好潇洒,她就喜欢我穿军装的味道。我读着信,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套军装,我一直珍藏着,轻易舍不得穿它。我每每打开衣柜,轻轻抚摸着它,似乎又回到了青春岁月。前几天,为了拍摄一张“我与军服的对话”主题照片,我把它拿出来挂在衣架上,当年的情景和那份急切、兴奋的心情,又一遍一遍在我脑海中萦绕。

在我心中,军装是有灵魂的,它附着着军人的荣光与使命。穿上它,你会觉得勇气倍增,更加英勇无畏;穿上它,你会勇于担当,面对危险和困难平添智慧和力量!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共和国70华诞之年的清明前夕,我和同事们来到龙华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祭奠英灵。

这里可是1700多名烈士的安息地,我党早期许多优秀党员的殉难处。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党中央在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历经血雨腥风12年。这里是我党开展城市斗争的英雄圣地,是中国百年历史沧桑的一个缩影。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是革命先烈创作于国民党龙华监狱内的一首诗,是先烈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坚持信仰和理想,奋斗、牺牲、忠贞不渝的生动写照。

牺牲在龙华的烈士中,17岁的欧阳立安是最年轻的一位。13岁,他成为党的交通员,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部长。“冲冲冲!我们是劳动儿童

龙华英魂祭

■ 朱留家

团。不怕敌人刀和枪,不怕坐牢和牺牲!杀开一条血路,冲!冲!冲!”这是由他创作并被当年少年儿童广为传唱的歌词。就义前,他的“供词”是:“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他说:“我为正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欧阳立安的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早年为革命积劳成疾去世,母亲陶承在失去丈夫和儿子后,坚持斗争直到全国解放,曾写下了回忆录《我的一家》,拍成电影《革命家庭》后,教育了几代青年人。

在龙华烈士陵园的一侧,是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监狱旧址。一块灰暗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名牌被置于墙角,告诉人们当年它的罪恶,提醒今人勿忘历史。阴暗的男男女女,锈迹斑斑的镣

铐,使人们永远铭记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他们当中有: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龙,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杨殷,军委委员彭湃、颜昌颐……恽雨棠和李文是一对夫妇,恽雨棠果敢、刚毅,李文聪慧、率真,他俩在江苏武进投身革命,于黄浦江畔相恋结合,并追求同一真理,拥有共同理想。1931年被捕后,关押在龙华监狱。2月7日敌人对他俩下毒手,恽雨棠拖着沉重的脚镣,步伐坚定,从容不迫。李文怀着腹中的孩子,紧紧依偎丈夫,慷慨就义。陈乔年烈士在牺牲前写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著名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殷夫,拒绝了在国民党任高官的兄长“好意”,在狱中书写了由他第一次翻译成中文的裴多菲诗句言志:

古桥春色(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4496期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监狱牢房的后面,当年枪杀共产党人的刑场,芳草萋萋。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此处是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刑场遗址,1927年至1937年间,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此英勇就义。一棵老树的树干上,似乎仍布满弹孔。这里也是著名的龙华24烈士殉难处。1931年2月7日深夜,在对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无所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将24人秘密杀害,就地埋入预先挖好的深坑。其中有:林育南、何孟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共产党员和左联作家。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的陈延年烈士曾说过:我们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

烈士墓区,祭扫的人们手捧鲜花络绎不绝。灿烂的阳光下,我和同事们肃立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献上花篮,向烈士英魂三鞠躬,默哀,默念:我们脚下的共和国土地,会永远是红色的。

